

位于齐鲁大地东南部的莒县，春秋时期为莒子国；西汉时置县，属于城阳郡，东汉时属于琅邪郡。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分琅邪而立东莞郡，封司马佃为东莞郡王。咸宁三年（277），又以东莞合归琅邪。至太康十年（289），再立东莞郡，并将莒县划归东莞。这里便是以《文心雕龙》而著称于中国乃至世界文艺理论史和美学史的南朝文论家刘勰的故乡。

从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开始，西晋诸王互相残杀，酿成十数年的“八王之乱”，西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迁的少数民族上层，趁机纷纷起兵反晋，建立割据政权。永兴元年（304），匈奴左贤王刘渊以助成都王为名，在离石（今属山西）起兵，称大单于；不久迁至左国城（离石北），自称汉王。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刘渊攻占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是年十月，刘渊称汉帝。永嘉四年（310），刘渊死，其子刘聪夺得帝位。次年，刘聪派石勒攻破许昌，并乘胜大破晋兵；是年六月，刘聪的大将刘曜率兵攻陷洛阳，刚刚做了四年多皇帝的晋怀帝司马炽被掳至平阳，备受凌辱，不久即被鸩杀。这便是史书所

谓“永嘉之乱”。

永嘉丧乱以后，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不见人烟。史书上说，流离失所、卖妻鬻子者不计其数，加上蝗灾肆虐，瘟疫流行，以至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甚至“人多相食”。偌大的长安城中，还剩不足百户人家。就在这一片萧条、肃杀的气氛中，中原士人纷纷南迁，抛却世代居住的热土，躲避连年的战乱和疾疫。也就是在此时，刘勰的先祖随着大批南迁的士人从东莞莒县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

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刘曜进兵关中。是年十一月，晋愍帝出降，被送至平阳，西晋王朝在经历了52年后灭亡了。第二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南渡的官僚、士族地主集团和江南豪族势力的支持下，在建康（今南京）称晋王，翌年称帝，是为晋元帝，其王朝史称东晋。

东晋王朝建立六七年以后，晋明帝设立南东莞郡，属于南徐州，其州治即在京口。当时侨寓江苏的大批北方士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南徐州，而不少士人更以京口作为较理想的避难侨居之地。京口本来就是交通方便、经济发达的名都，大量的北方士人汇聚于此，更使其成为人才济济、人文荟萃之所。至少从刘勰的曾祖父开始，刘氏一族便生于京口、长于京口了。

一 坎坷一生

刘勰，字彦和，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其祖父刘灵真，除了《梁书·刘勰传》提到乃“宋司空秀之弟也”以外，不见于史传记载。刘秀之为宋代司空，官位仅次于丞相。如此说来，刘勰的家世是颇为显赫的。但不少研究者以为，《梁书·刘勰传》的这句话实不可信：刘氏虽是东莞望族，但刘灵真这一系已属旁支远族了。因此，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

（一）定林俗客

六朝时期，士庶之别犹天壤之隔。即使你有满腹经纶，即使你才华出众，一旦出身庶族寒门，也就几乎进身无望了；而血统高贵者，他们生来就是做官的，以至于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这就是《晋书》上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所谓“公门有

公，卿门有卿”，也就是西晋著名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中所痛斥的：“世胄蹑高位 英俊沉下僚！”

不过，虽然整个六朝时期士庶区别的大势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是有所不同的。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便以平民身份而靠军功起家，因此刘勰出生的时代应该就是士庶区别有所缓和的时期。也许正因如此，就在刘勰出生前后，他的父亲刘尚开始步入仕途。至刘勰五岁左右，也就是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前后，刘尚升任越骑校尉一职。越骑校尉乃是汉代所设置的五校尉之一，位列七班，选中者皆以其才力超越。刘尚得以升任中级官吏，这对刘勰的童年是有影响的。另外，宋明帝于泰始六年（470）设立“总明观”，并设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同时推举士人 20 名，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也会影响到刘尚对幼年刘勰的教育。

刘勰七岁之时，做了一个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梦。他梦见了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援而采之。显然，刘勰之有如此吉祥的美梦，正以上述背景做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见，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正是儒家的建功立业思想。然而，美梦总是很少会成为现实的。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刘尚在一次保卫首都建康的战斗中战死，刘勰时年八岁。这一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梁书·刘勰

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可见其父亲的早逝对刘勰的一生产生了何等重要的影响。

从父亲去世到二十岁左右，刘勰在发愤读书中度过了自己从少年至青年的这段时光。479 年四月，宋顺帝被迫禅位于萧道成，是为齐高帝，历史进入了齐代。萧道成 13 岁受业于著名儒士雷次宗，研究《礼》及《左氏春秋》。因此他即位以后，便重用长于经礼的王俭，自此君臣唱和，儒学大振。建元四年（482）正月，齐高帝设立国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崇儒重学之风吹遍江左士林。是年三月，齐高帝萧道成卒，太子萧赜继位，是为齐武帝。他更是承继高帝之风，对儒学之兴推波助澜。他不仅仍重用王俭，而且优礼有加。上行下效，一时形成《南齐书》所谓“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的盛况。当此之际，少年刘勰所受到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萧齐政权在弘扬儒学的同时，对佛教亦极为重视。齐武帝萧赜刚刚即位之时，皇太子萧长懋便将当时大乘佛学之名僧集中于宝地禁苑“玄圃园”安居。齐武帝即位的第二年（永明元年，483），被封为竟陵王不久的萧子良更召集名僧，开设讲坛；佛徒高僧济济一堂，形成沈约所谓的“旷代之盛事”。萧长懋还以皇太子之尊，萧子良则以竟陵王之贵，拜定林寺僧柔及僧远等人为师；其敬重佛徒，可谓顶礼膜拜。这对刘勰的一生也产生了至关重

要的影响。

永明四年（486）前后，也就是在刘勰二十岁左右，他的母亲又去世了。此后，在刘勰为母亲守孝的三年时间里，齐竟陵王萧子良大开西邸，招集儒、佛和文学之士汇聚鸡笼山，抄五经百家，编《四部要略》，讲梵语佛法，造经呗新声，不仅把崇儒重佛之风再次推向高潮，而且亦使永明文学盛极一时。萧子良门下，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八友”，或品味山水神韵，或探讨声律对仗，或讲究用事敷陈，或推敲丽辞雅义，诗酒游宴，音声唱和，崇文之风，弥漫江左。

可以想见，居丧中的刘勰必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时风的变化。《文心雕龙》中强调“贵乎时”这是刘勰从世事的浮沉、家庭的变故中所得到的深刻体验。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庶族寒门而又无依无靠的人来说，要想取得进身之阶，洞察时世、抓住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离开时代的大江大河，自己的涓滴之水是很快就会干涸的。然则，时风是什么呢？可以说，佛学与文学的并行不悖正是刘勰所处的时代氛围。佛教与文学原本关系不大，然而皇亲国戚之道俗相兼，尤其是竟陵王萧子良的推波助澜，使得佛教与文学相得益彰了。

永明八年（490）前后，刘勰来到了京师，举步踏入钟山名刹定林寺。千载悠悠，我们今天无从揣测

刘勰当时的心情，但举目无亲而逼人佛门的无奈是可以想见的。不过，这却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感情冲动之举。在上述崇儒重佛的文化思想背景之下，在佛学与文学并行不悖的时代氛围之中，无所依傍的刘勰决定进入佛门，正可以视作一举多得的“贵乎时”的行为。这不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学习提供了条件。同时，从此便可安居京师之地以“待时而动”了。

《梁书·刘勰传》是这样记载的：“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这句简单的“积十余年”意味着刘勰几乎全部的青春时光都是在定林寺度过的；而沙门僧祐则成为这一时期刘勰生活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僧祐俗姓俞，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祖籍彭城下邳（今徐州邳县），生于建业（今南京）。幼儿时期，父母带其入建初寺礼拜，便表现出对佛教的浓厚兴趣，竟至不肯回家。父母只好从其所愿，任其出家入寺，奉僧范为师。父母本以其年幼任性，未必真心向佛，所以当他14岁以后，便私下里为其订下婚事。谁知当他知道以后，便逃到定林寺，投靠法师法达。法达乃是定林寺创建者昙摩密多的弟子，其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僧祐竭诚奉事法达，更加执操坚明，其家庭亦莫可奈何了。年满具戒以后，僧祐又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随侍

心二十余年，竭思钻求，晨昏不辍，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成为佛家律学名僧。法颖去世后，正值竟陵王萧子良倡隆佛法之时，僧祐自然经常被请去讲律，听众常达七八百人之多。

显然，刘勰跟随僧祐十余年，所受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比如，《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家贫不婚娶”，其实“家贫”可能只是原因之一，而与之朝夕相处的大德高僧僧祐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永明十一年（493）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刘勰作为僧祐的得力助手，以主要精力帮助整理佛经，厘定文献，区别部类，造立经藏，撰制经录。僧祐《法集总目序》说“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其中艰辛自不待言，却也使刘勰“博通经论”，成为佛学的专家。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一篇重要的佛学论文《灭惑论》。

齐明帝建武五年（498）前后，已逾而立之年的刘勰又做了一个美梦。他梦见自己手捧红色的祭器，跟随孔子向南走。梦醒以后，他感到非常高兴。遥想夫子当年，尚且慨叹自己很久不再梦见周公了，而今，他老人家竟然托梦于自己这个无名小卒，这难道不是重任在肩吗？

(二) 翦笔论文

刘勰身居佛寺而梦随孔子，这与其居于佛寺十余年却并未出家一样，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他人生理理想的必然。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袒露了自己的心曲。他说，在这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宇宙中，有黎民百姓，也有达官贵人；而真正能够出类拔萃者，靠的是聪明才智。可是，岁月如白驹过隙，时光一闪即逝，人的身体连同其智慧也是不能久居的。

《庄子》上说：“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然而，相对于浩渺的宇宙而言，人又能“心意自得”几年呢？所以，要把声名永播，想让事业长存，看来只有依靠写作，将自己的作品留在世上了。刘勰说，人类的形貌取法于天地，人类的本性来自于“五行（水火木金土），人的耳目可比日月，人的声气有似风雷，人类超过了天地之间的万物，人类乃是宇宙之精灵、天地之中心。可是，人的肉体比之草木又能坚硬多少呢？正如“古诗”所说，“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真正可比金石而流传久远的，只有名声了。大概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古人说，君子之处世，首先是“立德”，其

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只有这三者才可以传之久远，才能够不朽。对刘勰来说，“立功”一途遥不可及，也就只有著书立说而“树德建言”了。

所以，刘勰身居佛寺却与孔夫子心灵相通，良有以也。至于著书立说的具体方向，刘勰也有自己的考虑。他想，要阐明圣人的思想，最好的途径当然是给经书做注解，但是东汉的马融、郑玄等大儒已经做了精深的阐述，自己即使在某些方面仍有一些深入的见解，也难以自成一家了。然而，考察文章的作用，其作为经书的辅佐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祭祀、丧吊，还是朝觐、阅军，抑或婚嫁、冠礼，各种仪节都要靠文章来完成；国家的政治、教化、礼乐、军事、刑法、经济等等一切政务，无不靠文章来实施；至于君臣之间的沟通，军国大事的阐明，当然更离不开文章了。刘勰以为，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作用的各类文章，无不来源于儒家经典；正是儒家经典为后世文章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也为后世文章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任凭文苑笔场百家腾跃，无论翰林华国诸子驰骛，终究跳不出儒家经典的圈子。所以，“论文”一途同样可以通向儒家经典，也就可以完成孔夫子的重托了。

其实，刘勰不走“注经”之路，未必真的完全因为马融、郑玄等人“弘之已精”了。虽然此时仍然重视儒学，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早已成为

历史，而儒学和佛学的交融统一、佛学和文章的相得益彰以及文章本身的繁荣发展，才是时代的潮流。尤其是永明文学之盛给刘勰的熏陶和启迪，实在使他不能不去“论文”。更重要的是，以孔子之托而有“论文”之必要，乃属当务之急：这便是《序志》所谓“去圣久远 文体解散”也就是近世文章的发展由于离开圣人越来越远，因此文章的体制逐渐败坏，以至于有“文将不文”的危险。简而言之，那就是诗写得像诗，赋写得不像赋……总之是失去了文章的规范。结果也就出现了刘勰所深感忧虑的文风：一味追新逐奇，崇尚浮浅怪异的语言，过分注重词藻的修饰，就像在已经装饰过的华丽羽毛上再加文饰，又如在不需要修饰的腰带和佩巾上再绣以花纹，忘记了其本来的面目和用处，有似买椟还珠，仿佛秦伯嫁女，从而也就离开了文章的根本，而走上文体错讹、辞采泛滥的道路。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文章写作的繁荣发达，另一方面是创作方向的误入歧途；作为“经典枝条”，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整而任凭自然生长，后果何堪设想？这正是孔子之所以“乃小子之垂梦欤”的原因。以此而论，则所谓“论文”，不仅事出有因而势在必行，甚至比“注经”更为重要了。

从建武五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三月，刘勰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以大约四载的光阴，全力结撰自己的论文之作。精研儒家经典之义理，深究佛门

玄谈之论辩；标举文章写作之准的，探索知音赏鉴之奥秘。诗骚赋颂，有韵之文搜罗殆尽；章表奏记，无韵之笔囊括不遗。深入艺术构思之过程，辨别艺术风格之雅俗；明确文学的时代理想，概括文学的本质特征。纵观文学发展之道路，体察文学自然之关系；总结比兴夸饰之方法，规范融会剪裁之手段。篇章字句，安排推敲精雕细刻；音韵声律，和谐流畅婉转自然。有时含笔腐毫苦虑劳情，有时援牍口诵文思泉涌；有时情饶歧路纷杂难断，有时敏在虑前应机可决。春花伴精推荣枯，秋月共细思圆缺；雨打寺门迟迟闭，雪落禅径踽踽行。星汉灿烂之永夜，常思五彩祥云之梦；赤日炎炎之长天，恒记夫子仲尼之托。暮鼓晨钟里奋笔疾书，青灯黄卷前戛戛独造；道不尽伏案抽思之苦，说不完建言寄情之乐。

呕心沥血四个春秋，刘勰在定林禅寺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章，并为这一精彩的华章定下一个动听千古的美名：《文心雕龙》。

（三）逢其知音

《文心雕龙》书成之时 正值齐梁禅代之际。502年三月，齐和帝禅位；四月，萧衍即帝位，是为梁武帝，改元天监。无论谁做皇帝，定林寺的暮鼓晨钟都会照例敲响；但对刘勰而言，心情有所不同。他已身

居定林十余载，却一直是白衣之身。既不愿出家为僧，则长此以往又怎能甘心呢？回首悠悠岁月，已历宋、齐、梁三朝；屈指青春年华，则近不惑之年。其人生之路通向何方，已是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

可以想见，望着用心血铸成的《文心雕龙》，刘勰没有如释重负之感。他发愤写作此书，当然是秉承儒家圣人之大道，为文章的写作确立千古不易的法则，为文学的发展找到纵辔远行的通衢。然而，他同样期望这部书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新的开端，而不是像司马迁著《史记》那样准备“藏之名山”。可是，以自己无名小辈，又久居寺门之内，纵有旷世惊人之作，又怎能得到时人之肯定和承认呢？刘勰想到了沈约，一个历仕宋、齐、梁三朝并成为当朝权贵而又身兼文坛领袖的人。

沈约，字休文，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其先世乃东吴世家大族。祖父沈林子曾为刘宋开国君主刘裕的参军、征虏将军，刘裕即位后，封其为汉寿县伯，迁辅国将军。沈约的父亲沈璞，文帝时官至宣威将军、盱眙太守，并以防魏有功，转淮南太守。宋文帝死后，王朝内乱，刘骏起兵夺得政权；由于沈璞未能及时响应，被宋孝武帝刘骏所杀。时年 13 岁的沈约四处潜逃，后遇大赦，幸免于难。

沈约从小便笃志好学，昼夜不倦，他的母亲恐其

劳累过度而生病，不得不经常减少其灯油或灭掉其灯烛。正是由于他的苦读，使其博览群籍，精研文史，二十多岁便有著书立说之意。宋明帝泰始元年（465），25岁的沈约起家奉朝请，并为尚书右仆射蔡兴宗赏识；两年后，蔡出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便引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泰始五年（469），蔡升任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又以沈约为征西记室参军等职。刘宋末年，沈约入朝为尚书度支郎。

齐高帝建元元年（479），39岁的沈约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南郡王萧长懋的记室。建元四年（482），齐武帝萧赜即位，立萧长懋为太子，沈约被任命为步兵校尉，掌管东宫书记，受到太子的特别看重。后迁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永明年间，沈约还受到竟陵王萧子良的赏识，为其门下“八友”之一。永明八年（490）以后，沈约迁中书郎、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以及御史中丞等职。齐郁林王隆昌元年（494），竟陵王萧子良辅政，54岁的沈约升任吏部郎。萧子良不久病死，沈约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齐明帝即位以后，沈约进号辅国将军。建武二年（495），55岁的沈约被征为五兵尚书，两年后迁国子祭酒。明帝死后，沈约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南清河太守。

齐和帝中兴元年（501），曾为“竟陵八友”之一的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不久便召集 61 岁的

西邸旧友沈约，引为骠骑将军司马、左卫将军。沈约趁机劝萧衍代齐而立，言之殷殷，深得萧衍欢心，以约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成为帮助萧衍成就帝业的功臣。梁武帝受禅，以沈约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

刘勰之想到沈约，除了以其当朝勋贵的特殊地位，还因为沈约更是一代辞宗，是齐梁文坛的领袖。他重视声律在诗歌创作上的重要作用，与谢朓等人创立了永明新体诗，推动永明文学盛极一时。其五言诗清怨和谐，意境独到，骨采完备，精拔可读。更重要的是，沈约以官场浮沉数十载、阅尽人间冷与暖的通达，加之对文学本身的精通，对文坛新人奖掖有加、不吝提拔；其谦谦儒风，受到文人学子的敬重与爱戴。凡此种种，使得刘勰把希望寄托在了沈约的身上，希望自己的《文心雕龙》能得到沈约的青睐；哪怕只言片语的品评，只要略予褒奖，也就不致使自己的半世心血付诸东流了。

但是，一个颇为简单却又十分困难的问题是，怎样使《文心雕龙》到达沈约的手中呢？《梁书·刘勰传》是这样记载的：“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千载之下看来，这实在是颇富戏剧性也颇有喜剧性的一幕；然而不难想见，刘勰迈出这一步，需要多大的勇气，又要承受多少痛苦的折磨！这不禁令人想起颇为相似的

一幅历史画面：三国曹魏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撰成论才性同异的《四本论》，自己颇为看重，欲取定于当时名士嵇康，于是便怀揣书稿来到嵇康宅外。徘徊有时，终于没有勇气敲门，便从门外抛至嵇康家中，急急忙忙逃走了。显然，以彦和当时之状况，尚难比钟会；以沈约当时之隆达，则远超嵇康。王公侯门深似海，即使想如钟会那样抛至其家，也是难以办到的。不过，刘勰不是叶公好龙之辈，他迈出了一般人难以迈出的一步。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惜墨如金的《梁书·刘勰传》做了较为详细而生动的上述记载。

当然，《梁书·刘勰传》之所以详细记述，也许还在于这件事情的结果。其云：“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无愧为一代文坛领袖。其“便命取读”的态度固然显示了他的贵而无骄，其“大重之”的激赏固然再次证明了他奖掖后进之无私，其“深得文理”的评价固然说明了他的目光深邃，而其“常陈诸几案”的举动则更属难能可贵。

（四）奉时骋绩

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前后，37岁左右的刘勰“起家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既不为官，亦无职任；但既已“奉朝请”，则正式踏上

仕途便指日可待。如上所述，沈约也正是自“奉朝请”开始其漫长的仕宦生涯的。对刘勰来说，直至进入人生之中年方得“奉朝请”，其人生的青鸟确乎是姗姗来迟了。不过，以庶族寒门的身世，其父亲又战死而无功，加之久居佛门十数载，自然与出身世家大族的沈约是难以比拟的。按照梁代的官制，世家大族之人 20 岁便可踏入仕途，庶族寒门之人只有年过 30 方得“试吏”，左思《咏史诗》所谓“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又奈其何！以此观之，则彦和纵然年近不惑才开始步入仕途，亦算颇为幸运了。

天监三年（504），刘勰终于正式踏上仕途。是年正月，梁武帝之弟，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进号中军将军；其开府置佐，网罗幕僚，刘勰有幸成为他的记室。萧宏对定林寺并不陌生，他对僧祐更是“尽师资之敬”；刘勰既已“起家奉朝请”，且具文学才华，则引之为记室，可谓顺理成章。记室之位虽然不高，然其专掌文翰，职务乃是颇为重要的。正因如此，记室之人的选择相当严格。先后在萧宏幕府中任记室之职者，有王僧孺、殷芸、刘昭、丘迟、刘沼等人，或出身势族高门，根基深厚；或励精勤学，博洽群籍；或文章名世，工诗能赋；或少有奇才，为世所重：皆为一时之选。因此，刘勰一入仕途便成为萧宏府中记室而居枢要之职，亦可谓幸运之至了。

天监四年（505）十月，梁武帝大举攻魏，命令